

# 论明治维新前后 日本洋学兴盛的社会条件

许晓光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洋学兴盛,出现了大规模主动吸收西方大量先进思想文化的现象,它对日本率先在亚洲迈入近代化发达国家行列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在亚洲独一无二的现象,是因为当时日本内部受到幕藩制统治危机的威胁,外部受到列强的武力压迫。改革日本社会现状的精神动力,不可能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求,只有向更加发达的西方社会学习,吸收其已被实践证明是更加先进的思想文化,用以指导日本近代化的实践。这种洋学兴盛的社会条件表现在国民意识的觉醒、明治政府的大力提倡、民间结社的涌现、洋学机构的设置、留学生的出国学习、翻译出版传媒事业的发展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明治维新前后;日本近代思想文化;日本洋学;国民意识;民间结社;翻译

**中图分类号:**K31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2-0126-07

近代日本能够在内忧外患的局面下迅速摆脱落后状况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进而对亚洲各国构成威胁,其精神动力决非一般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来自内部传统文化,而是源于对更加先进发达的西方思想文化的吸收、消化、改造和运用,其具体表现就是洋学兴盛。所谓“洋学”,是指日本相继学习来自葡萄牙的“南学”、来自荷兰的“兰学”以及来自英、法、美等国文化的另一称谓,即日本吸收欧美先进国家的思想文化后形成的学问,有别于依据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而形成的学问。洋学为何会在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兴盛?日本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主动大量地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而亚洲其它国家却没有出现此类现象,其原因何在?目前,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尚不充分。笔者认为,日本洋学兴盛的状况之所以没有在亚洲其他国家出现,与日本当时所处的特殊的社会条件包括舆论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考察这一社会条件,可以

更加圆满地诠释日本为何能先于亚洲其他国家主动大量地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并将其运用到本国实践中,进而推进日本文明迅速发展,并在亚洲率先迈入近代化国家行列的原因,同时得到一些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教训。

## 一 国民意识的觉醒和舆论环境的相对宽松

日本国民之所以在明治维新前后的一段时期内,特别集中地大量吸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与当时内外形势的促使密切相关。1853年,美国军舰武力威胁日本通商,使实行相对“锁国”政策200多年的日本被迫“开国”;后来,日本又与欧美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所谓“亲善条约”,造成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日本社会有识之士一方面感受到欧美列强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又痛感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以便早日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德川幕府统治末期至明治初期,在这种外部列

收稿日期:2007-10-12

作者简介:许晓光(1955—),江苏扬州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研究亚洲尤其是日本历史和思想文化。

强压力和内部封建制日趋倾颓的现状刺激下,“日本向何处去”的生死抉择促使日本国民意识逐渐形成。尤其是列强与日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更加激发了日本国民民族意识的高涨。近代日本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1863-1957)认为:“国民之观念乃相对之观念也,与外国接触以来,此观念始发挥也。”<sup>[1]205</sup>这种由于受到外部压力而激发起来的国民意识很快便成为推翻封建统治的动力:“国外的警报立即诱发对外之思想,对外之思想立刻发挥国民之精神,国民之精神马上鼓吹国民之统一。国民之统一与封建割据势不两立。那些外国思想刺激了日本国家之观念。日本国家之观念产生之日,此乃各藩观念消灭之日。各藩观念消灭之日,此乃封建社会颠覆之日也。”<sup>[1]209-210</sup>即日本之所以会出现与“藩民”相对立的“国民”这一近代化观念,会出现鼓吹国家统一和推翻封建统治的“国民精神”,与这一时期日本接触到更加先进的外国思想文化关系密切。

“强有力的影响也可以通过外来入侵引进,这威胁着不能挑战的社会之生存……社会以各种方式面临挑战,并且不得不对付它们”<sup>[2]52</sup>。列强带来的外部压力迫使实行“锁国”长达200多年的相对封闭的日本迅速向开放型社会转化,这恰如“在被封闭的棺材中,被小心深度保存的木乃伊,一接触到外面的新鲜空气,便忽然崩溃了”<sup>[3]3</sup>。日本人民眼见幕府统治下的封建社会在内忧外患下日趋崩溃,国民生计朝不保夕,对外敌的仇视和对幕府统治的憎恨,迅速构成了促使德川幕藩体制瓦解的动因而发挥着作用。外部压力激发国民精神日渐觉醒,长期以来强烈支配人们头脑的“藩的思想”逐渐淡薄并渐趋消亡,“日本国民的思想”正澎湃兴起。正如当时的著名史学家竹越与三郎(1865-1950)描绘的那样:“美舰一朝进入浦贺……列藩之间猜疑、敌视的观念如烟消云散般泯灭,三百列藩乃成兄弟,几百千万的人民成为国民,日本国家的思想在此油然涌出。”<sup>[4]7</sup>竹越的描绘虽有些夸张,但生动说明了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日本的国民意识逐渐觉醒和统一国家的迫切要求已迸发出来。这种新的意识和要求必定要有新思想进行导向,将其引向建设近代化国家的方向。

明治政府刚成立的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便在《五条誓文》中提出了“应求智识于世界,大振皇基”<sup>[5]68</sup>的誓词。新掌权者不仅要求自己

家理性,而且打破了以前的墨守陈规之风气,主张全国人民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由此日本人民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文化的热潮势不可挡。竹越针对当时的日本现实论述道:“如此,以妖怪为依据的乡村佛教首先被自然科学所颠覆;由迷信和恐怖所维持的社会上下等级,被自主自由的文字打破;旧风旧习皆被文明开化之文字搅乱。夫旧社会之纲纪唯恐惧和迷信也。旧社会之人民,若不为违犯法律之恶事,由于迷信;彼等若不犯上,乃由于恐惧。然而今天,此恐惧和迷信被滔滔大波从根底荡涤。人心作为正在被解放者,几乎与十八世纪欧洲人民一样可观。”<sup>[4]152</sup>这段文字生动描述了幕末到明治初期日本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剧烈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出日本人民接受西方近代化思想文化的热情,也表明进一步学习和宣扬这种先进文化有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同时,明治政府在政策措施上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大。“明治政府在废除等级制度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他们先是创立了近代的教育制度,后又雇佣有能力的大学毕业生到政府部门工作而不问其家庭背景如何。近代日本在一个值得赞扬的有效的君主立宪的官僚政府的领导下,经历了一场奇迹般的经济与军事上的扩张”<sup>[6]26</sup>。当时的状况,“正是完成了废藩置县的明治政府,接连不断地出台废除身份制度、颁布学制、征兵令、地租改正条例等重大改革政策的时候。在此汇集的人们的思想中,具有共通的特色”。这种共通特色包括:“第一,相信新政府抛弃了攘夷的陋习,采取了开国进取、文明开化的政策,将人民从专制中解放出来,正在完成向国家富强大步迈进。第二,认识到比起欧美强国来,开化仍不先进,尽管外表盛大,内容并不伴随之,人民因而愚昧,卑屈无力。”<sup>[7]447</sup>人们对社会和国家事务的关注程度比以前有所提高,表达思想的欲望更加强烈。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的舆论政策也相对自由,连西方学者也认为:“新政权的第一个十年左右是在许多方面相对‘自由主义化’的时期。建立有时被称为‘天皇制’的镇压机构和意识形态网,实际上只是到了1881年才开始的。”<sup>[8]56</sup>这种评价是否完全正确姑且不论,但与前述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相对照,可发现明治初期的舆论环境是相对宽松的。

## 二 民间结社的大量出现

洋学兴盛的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明治政府成立后一段时间内,社会民间结社纷纷出现。这些结社中最有名的,当数明治6年(1873)由当时最著名的洋学家西村茂树、森有礼、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津田真道、西周、箕作麟祥、箕作秋坪、杉亨二等10人组建的“明六社”。该社的宗旨在于大力宣传文明开化和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对文明开化过程中的一些社会问题展开学术讨论。正如该社发起者西村茂树解释的那样:“本朝学术文艺之结社,始于今日。而社中诸贤皆天下名士也。人皆谓,卓绝奇伟之论,千古不磨之说,必兴起于此社。希望以诸位先生之卓识高论,使愚蒙觉醒,立天下之模范,以不负识者之厚望。”<sup>[9]58</sup>明六社成立的次年,即1874年2月,制定了《明六社规章》,兴办机关杂志《明六杂志》。社员先后有30人。大家在杂志上就自己对社会各方面问题发表意见,展开讨论,使这个社团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个思想启蒙组织。由于其成员发表的论著不少涉及政治问题,使这个组织开始带有政治色彩,引起了政府方面的忌讳。为此,发起者森有礼于1875年2月告诫成员:“吾社所要讨论之问题,已如规章第一条所定,专限于有关教育之文学、技术、物理、事理等,皆为丰富人之才能、增进品行所需要之事。而其收效只能期于后世,或也会有触犯今日嫌忌之事,也乃出于不得已。然而至于如有关现时政事之讨论,却非吾社开办之主旨。且不仅劳而无功,亦由之或许会给本社招致不必要之困难。故现今为了将来本社利益考虑,预报于此,愿诸君谅解。”<sup>[10]199</sup>1875年6月,明治政府颁布《新闻纸条例》和《谗谤律》,左右为难的明六社宣告杂志停刊,组织解散。但该社成员所发表的大量论文,宣扬近代化思想,对明治初期的日本人民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鉴于“我邦尚未完全进入开明之美域,人民依然沉迷于封建时代的恶习污风,各自不辨识其权利之自由为何物。宜兴一大法律学校,使国民从法律上熟知权利之可贵,自由之可重。以可树立代议政体论实现之基础”<sup>[11]17</sup>,1877年,大井宪太郎(1843-1922)等人组建了“讲法学社”。该社成立后,在宣传欧美近代法治思想、启迪人民的法律意识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到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明治11-14年(1878-1881),各地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豪农、平民和

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结社纷纷出现。明治13年4月8日,《近事评论》描述了当时日本社会结社状况:“今也,我日本人民逐渐洗涤数千年来积蓄在头脑中的卑屈精神,开始振奋自由之气魄。集自由之气魄,论国政之如何。三府三十余县有志者竞相结合,名曰之某某社,各自以议论国家将来之福利,大为奋进而定立宪之政,构成希望国会开设之时机也,构成开国以来我人民开始欲获得自由民权之时机也。”<sup>[12]533</sup>

除了上述学术研究和推广法律的结社之外,农村的农民也纷纷组建农谈会、集谈会、劝农会、农事会等。如1873年成立的耕耘社,1877年组建的开农社,1878年设立的爱身社,1880年成立的亲睦社、特振社、劝农社、上毛联合会,1881年成立的精农社等。各地还出现了学习西方文化和发展教育的结社,主要由士族和豪农子弟加入,其最早者是1874年成立的高知立志社中的立志学舍和求我社中的行余学舍。1875年,在京都设立了天桥义塾,社员达400名,其中150名为士族,其他为豪农、商人等。同年,在福岛的石阳社内,设立了石阳馆。1879年,五日市组建了学艺讲谈会。在这些为了学习教育而成立的结社内,除了学习语法、数学、博物、文学、历史等文化知识外,还花费较多时间学习经济、法律、政治理论等课程。一些宣传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著作,如《英国文明史》、《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国法泛论》、《民约论》、《社会平权论》等,皆成为这些课程的教材。在这些接近学校性质的结社里,出现了不少后来在近代民权运动和宪政运动中的民权家和宪法草拟者<sup>[13]35-40</sup>。

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政治结社,这时也大量出现。1874年4月,板垣退助等在土佐成立立志社;接着,小室信夫在阿波成立自助社;1875年2月,在大阪会议后10天,板垣的下属结合全国自由民权派,在大阪召开了组织爱国社的大会,相约在东京设置本部。1875年8月,河野广中在福岛县石川创立石阳社,成为东北政社的嚆矢;1878年1月,在三春设立三师社;接着,长野的奖匡社、福冈的向阳社等等陆续创立。1878年4月,以立志社为中心,开始重兴爱国社,9月在大阪开大会,参会数十人作成“爱国社再兴会议书”;1879年3月,在大阪开第二次大会,11月又在大阪开第三次大会,有17县21社的代表参会,以板垣退助、河野广中为中心,决议

公布“为达到国会开设愿望告四方众人书”。1880年4月,在大坂召开第四次大会,27社、2府、22县共140名代表参会,将爱国社的名称改为“国会开设愿望有志会”;后制订《国会期成同盟规约书》和《国会期成同盟会议书》,该结社遂称为“国会期成同盟”<sup>[14]336-337</sup>。这些政治结社后来有些转变为政党。它们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和宣传本组织政治主张的同时,也推进了明治前期政治思想的活跃。

### 三 洋学机构的设置和出国留学、考察活动的开展

随着日本内外时局的迅速变化,早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日本强烈感受到俄国和英国军事力量的威胁。1853年,美国军舰强迫日本开国后,日本与外国接触机会陡增。为了应对急剧增加的外交事务,同时也为了增强国力,减轻民族危机的压力,幕府由限制和有选择地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转变为主动地学习包括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先进思想文化。为此,幕府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

首先,建立一个学习、翻译和教授西方思想文化的综合性机构。因为在进行外交活动时,需要大量翻译外交文书,当时承担各国外交文书翻译的主要是长崎的荷兰“通词”和附属于天文台的“蕃书和解”两种翻译人员,数量极为有限,不能满足急剧发展的外交事务的需要。于是,幕府力图扩大后一种翻译人员的数量,任命林健和山路弥左卫门为“异国书翰和解御用挂”,又从“蕃书和解”中提拔了箕作阮甫、杉田成卿担任“翻译御用”。另一方面,在外国军事力量的压迫下,日本从国防角度考虑,亟需大量充实由西洋引进的近代化军事装备,培养懂得使用这些装备的人才,这加剧了翻译和教授外语人才的紧缺。1853年7月,应幕府询问,胜麟太郎(亦名胜海舟)在《海防意见书》中指出:“教练学校建于离江户三、四里处,文库中集中了和汉兰之兵书、铨学书。其内若分科,被研究的有天文学、地理学、穷理学、兵学、铨学、建筑学、器械学等。若御家人内人数不足,可由各藩招人,选拔为教授……且又近来翻译书籍大量流传,其趣意多为杜撰。若对天下有所裨益之书,可命学士翻译,由官方公布于世,以免有上述醉心于杜撰惑说之事。”<sup>[15]32</sup>

根据这一建议,次年幕府当局将原来的天文方扩大再编成洋学所。洋学所实际也是洋学校,同时统辖天文方下属的西洋事务调查局以及洋书译局,

并且兼洋学统制机关,1855年称为洋学所,1856年改称蕃书调所,以后又称洋书调所,1863年改称开成所<sup>①[16]72</sup>。以后,在长崎、横滨、箱馆等城市,也建立了类似的学校机构。

这类学校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日本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转变,即由兰学转变为“洋学”,由被动、零星地接受西方文化,转变为主动、有系统地学习和引进西方思想文化。洋学既包括了荷兰文化,同时也包括英国、俄国、美国、德意志传来的思想文化。其内容也从以自然科学为主、很少涉及社会科学,转变为学习和研究一切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福泽谕吉认为,洋学是以兰学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嘉永美国人渡来我国,始订和亲贸易盟约。又因按英法俄等各国其好,我邦形势最终一变。社会士君子皆知精通彼国情况之重要,因而百般学科顿时兴起。各首倡其学,教育学生。至此,始起洋学之名。是岂非文学之一大进步耶。盖欲将开辟一事一运,进必以渐。譬如上楼阁有阶梯。乃天保弘化之际兰学盛行,宝历明和诸哲由此初成阶梯。方今洋学繁盛,虽因与各国通好,但实为天保弘化之诸公渐成阶梯。然则吾党今日之遇盛际,非得于古人所赐耶?”<sup>[17]21</sup>许多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就是先作兰学家,后来又成为洋学家。如福泽谕吉就在《自传》中详细谈到了自己先学习和翻译荷兰语,接着又学习和翻译英语的过程<sup>[18]81-87,98-104</sup>。以后除了在幕府直接控制的中心城市外,洋学又向各藩蔓延。

第二个措施是派遣留学生向西方学习。自从美国军舰叩关浦贺,让日本人大开眼界以后,日本人想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的愿望就日益强烈。幕末著名藩士吉田松阴(1830-1859)于1854年秘密登上美国军舰打算去外国考察,但因幕府禁止日本臣民直接与外国交往,吉田受到了严厉惩处。1861年,幕府正式向荷兰派遣留学生9人。1863年5月,长州藩士井上馨、伊藤博文等5人违犯幕府禁令,秘密留学英国,他们是日本最早的留英学生;此后两年,又有森有礼等17名学生留英;1866年,幕府正式向英国派遣留学生12名<sup>[15]98,101</sup>。同时,幕府和长州、萨摩藩等还向法、俄等国派出了留学生。当时迫于外国的军事压力和仰慕各国的科技发达,这些留学生大多是学习以军事技术为主的自然科学和工程类,仅有极少数学习哲学和社会科学。但值得注意的是,1861年派遣到荷兰留学的学生中,津田真道(1829-

1903)和西周(1829-1897)是专门学习社会科学的。

幕末到明治初期,留学西洋的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幕末中央和地方都在向欧美各国派遣留学生。据统计,这些留学生大多是在幕末出国,直到明治初期才返回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也十分注重向西方派遣留学生,1869-1870年,就用官费派遣留学生547名;1870年,发布《海外留学生规则》,规定留学生不分尊卑,从皇族至士庶皆可受到派遣<sup>[19]226-227,263-264</sup>。明治6年(1873),由日本思想文化界精英组成的“明六社”,其主要成员都曾到欧美留学或考察。他们将西方思想文化大量引进日本,对日本社会大规模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并运用这些文化指导日本近代化实践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三方面的措施便是派员出国考察。考察的对象是以军事工业为主,同时兼有“探索”各国政治法律制度的任务。幕府让下级武士、豪农子弟等加入使团的目的,就是派他们对西方国家进行“探索”。下级武士出身的著名学者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等都领受了这一特殊任务<sup>[20]17</sup>。对西方进行“探索”的对象多种多样。1861年,松平康直等三位使节在给幕府老中安藤信正的信中谈到了访欧的任务:“此次作为前往英法等国之使节,不仅按使节之事去做,当然也要探索外国之事情,以及可为我国共用之方式。”探索对象也包括各国的“建国之法”、“政俗”等。出发前的12月20日,安藤还给使节当面布置了120项需要调查研究的项目,其中对“各国政事、学政、军制者应特别关注”。蕃书调所也下达指令,要使团购买书籍,如“兵书、数书、政事书”,“经济、刑法、文武学校规则书”,“物产书”和“画学及音乐数类”等<sup>[20]24-25</sup>。幕臣福田作太郎就1862年探索欧洲各国写了一份报告书,其中谈到对英、荷、法、俄、葡、比各国探索的任务:如对英国、荷兰写得比较详细,包括国制、大臣、政治体制、军制、士农商差别、贫民救助、地产商贷手续、医院、商税、土地所有权、物价、运输、政府借贷、外国人居留等方面问题<sup>[21]478-544</sup>。

日本通过上述方式和渠道,先是被迫接受西方思想,后又主动、大量地引进这些先进思想,使日本思想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敌视外国“夷狄”、闭关自守的思想相比,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思想逐渐占据了上风,促使洋学在日本迅速走向兴盛。

#### 四 翻译、出版和传媒业的发展

列强的压力,迫使幕府不仅开国而且主动派留学生到西方先进国家学习,明治政府在一段时期内还放宽对舆论的限制,促成日本出版和传媒业的大发展。从幕末到明治,学者、知识分子翻译了包含西欧社会、文化、政治思想,特别是天赋人权和参与政治的思想、政治体制、法律秩序等各种著作,并逐渐出版,介绍和宣传西方社会制度的书籍在社会上大量流传。明治维新前后日本掀起了翻译欧美著作的高潮,它既是洋学兴盛的重要社会条件,也可以看成洋学昌盛的表现之一。这种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对后来日本的启蒙思想和民权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有日本学者认为:“支撑民权运动中活泼的言论活动的,是以西洋近代自由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和法思想的导入。”<sup>[22]75</sup>

在这些翻译作品中,有不少作品并非仅仅是照原文直译,而是加上了翻译者本人的注解,甚至夹杂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如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加进了自己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看法。中江兆民就在《民约译解》的注解中论述了自己对社会契约的观点。松岛刚将斯宾塞的著作《社会静力学》翻译为《社会平权论》时,还加上了自己的大量阐释。因此,翻译的过程,实际上是对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大规模吸收和宣扬的过程。在吸收和宣扬欧美各种理论的同时,欧美革命中的天赋人权论,密尔的自由论、代议政体论,边沁主张的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斯宾塞的权利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作为启蒙思想和自由民权思想的依据来源而被广泛接受。

除了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方著作之外,日本的新闻出版业在明治前期也急剧发展。在幕末日本,最早于1862年开始出现翻译的外国报纸《巴塔西亚报》,然后出现了少量官办报纸。明治政府成立后,由于舆论环境的宽松,报纸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仅以明治前10年为限,先后发行报纸234种,其中在政治上影响较大的如《中外新闻》、《东京日日新闻》、《东洋自由新闻》、《邮便报知新闻》等<sup>[23]605-612</sup>。明治前10年出版杂志179种,其中在政治上影响最大者当数《明六杂志》,该杂志共出版43期,刊登的论文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外交、社会、宗教、历史、教育、自然科学诸方面;此外,还有《民间杂志》、《万国丛话》、《评论新闻》、《近事评论》、《草莽杂志》及其变名者《莽草杂志》、《海南新

志》、《共存杂志》等<sup>[24]</sup>495-502 杂志影响较大。如此丰富的媒体,自然为大力宣扬各种新的思想文化提供了充足的载体,并在传播欧美先进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治时期的报刊,最初是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政策的工具,“但到 1874 年,民选议院建议书先由英国人经营的《日新真事志》,接着其他各报纷纷报道。其后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新闻记者和律师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sup>[25]</sup>343。思想家们通过这些媒体充分发表自己对政治的不同看法和观点,并展开了多次激烈的思想论争和交锋,促进了洋学在日本的进一步兴盛。

当然,由于明治维新是一场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革命<sup>②</sup>。明治政府主要由与天皇有血缘关系的公卿和萨摩、长州等藩的少数维新功臣组成,带有较多的寡头政治色彩。故当时的人们将其称为“藩阀政府”,学术界也将其称为“绝对主义王权”<sup>[26]</sup>15。在推翻幕府不久、新政府成立之初,采取了鼓励舆论的政策,这给思想家们自由宣传进步的政治思想营造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但当新的政治思想舆论兴起并迅速传播以后,尤其是 1874 年《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公布后,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兴起,政府开始逐渐压制言论自由。1875 年 6 月,政府颁布《报纸条例》和《谗谤律》,对舆论加以控制。如《谗谤律》规定:“凡不论有无事实,而将可能损害他人名誉之事公之于众者,除非举出所谗毁之人之行事,以恶名加

诸于人并公布者,构成诽谤之著作文书,或用图画肖像展览之,或销售,或张贴谗毁,或诽谤人者,按以下条例治罪。”<sup>[27]</sup>39-40 尽管如此,作为已经兴起的启蒙思想和自由民权思想,是不可能被轻易压制下去的。所以,在明治前期,由于洋学兴盛而产生的启蒙政治思想、民权政治思想等在日本社会广泛传播,同时围绕政治问题的思想论争也相继展开。

综上所述,明治维新前后促使日本社会思想大解放的洋学之所以会出现兴盛状态,得益于各方面的社会条件。既有外部列强压力和内部改革需求造成的民众觉醒,也有统治阶层中有识之士对欧美先进文化的接纳和包容。上下各阶层均意识到传统思想文化已不能作为解决本国存在的社会危机的精神动力时,便共同致力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思想文化,使日本出现了少有的大量吸收和宣扬欧美先进思想文化的繁荣局面。洋学兴盛反过来促进了日本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转型,使日本在亚洲最早缩小与欧美列强的发展差距而率先迈入近代化行列。这一历史现象充分表明,一个后发近代化国家或“赶超型”社会,必须最大限度地为吸收更加先进的思想文化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设置种种障碍,才能迅速缩小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加快本国向近代化社会发展。

#### 注释:

①该机构后来演变为东京大学。

②关于明治维新的性质,学术界观点颇多,本文不再一一列举,暂且认定其为社会政治革命。

#### 参考文献:

- [1](日)德富蘇峰.吉田松陰[G]//隅谷三喜郎.日本の名著 40.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 [2](美)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景跃进,张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 [3]马克思.中国和欧洲的革命[G]//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日)竹越與三郎.新日本史:上[G]//松島栄一.明治史論集(一).東京:筑摩書房,1965.
- [5](日)明治天皇.御誓文之御寫[G]//明治文化研究会.明治文化全集:第 1 卷皇室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
- [6](日)森島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M].胡国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7](日)遠山茂樹.思想[J].明六雜誌,1961.
- [8](爱尔兰)乔恩·哈利戴.日本资本主义政治史[M].吴忆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9](日)西村茂樹.開化ノ度ニ因テ改文字ヲ發スベキノ論[G]//明治文化研究会.明治文化全集:第 19 卷雜誌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
- [10](日)森有禮.明六社第一年回役員改選ニ付演説[G]//明治文化全集:第 19 卷雜誌篇.
- [11](日)平野義太郎.馬城大井憲太郎傳[M].東京:大井馬城傳編纂部發行,1938.

- [12](日)小野壽人. 明治維新前後における政治思想の展開[M]. 東京:至文堂,1944.
- [13](日)江村栄一. 自由民権革命の研究[M]. 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4.
- [14](日)指原安三. 明治政史[G]//明治文化研究会. 明治文化全集:第2卷正史篇上. 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
- [15](日)原平三. 幕末洋學史の研究[M]. 東京:新人物往來社,1992.
- [16](日)大久保利謙. 幕末維新の洋学[M]. 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
- [17](日)福沢諭吉. 芝新錢坐慶応義塾之記[G]//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0・学問と知識人. 松本三之介,山室信一校注. 東京:岩波書店,1988.
- [18](日)福沢諭吉. 福翁自伝[G]//福沢諭吉選集:第10卷. 東京:岩波書店,1981.
- [19]郑彭年. 日本摄取西方文化史[M]. 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 [20](日)松沢弘陽. 近代日本の形成と西洋経験[M]. 東京:岩波書店,1993.
- [21]英国探索[G]. 松沢弘陽校注//福田作太郎筆記5//日本思想大系66・西洋見聞集. 東京:岩波書店,1974.
- [22](日)松本三之介. 明治思想史[M]. 東京:新曜社,1996.
- [23](日)明治文化研究会. 明治文化全集:第18卷新聞篇[G]. 東京:日本評論社,1992.
- [24](日)明治文化研究会. 明治文化全集:第19卷雜誌篇[G].
- [25](日)岩崎允胤. 序説//日本近代思想史(明治期前篇):上[M]. 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2.
- [26](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 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册[M]. 马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27](日)明治政府. 讒謗律[G]//岡野他家夫. 増訂明治言論史. 東京:原書房,1983.

## On Social Environment for Japanese Western Learning Growth During Meiji Restoration

XU Xiaoguang

(History and Tourism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western learning prospers in Japan along with large scale active absorption of western advanced ideology and culture, which is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for Japan being the first modern developed country in Asia. The cause of the phenomenon is that Japan is threatened internally by the Shogunate-Fief system crisis and oppressed externally by the western powers' military forces. Its social environment is the awaking of the citizen consciousness, the Government vigorous advocacy, the establishment of popular organizations, the setting-up of western learning institutions, students' going abroad to further their stud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ss media.

**Key words:**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modern ideology and culture; western learning; citizen consciousness;

[责任编辑:凌兴珍]